



传奇晋商——

日昇昌兴衰浮沉

盛极一时财富聚

(上接第8版)

在当时,这样一种治理结构,带来的是日昇昌生意兴隆。日昇昌给晋商提供了一个样板,很快,晋商纷起效尤。日昇昌及山西一众票号的繁荣使海内外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汇聚于此。一时间,山西号称“海内最富,富可敌国”。

道光三年(1823年),日昇昌票号诞生,到道光三十年(1850年)已在北京、苏州、扬州、重庆、三原、开封、广州、汉口、常德、南昌、西安、长沙、成都、清江浦(在江苏)、济南、张家口、天津、河口(在江西)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。

咸丰、同治(1851年年至1874年)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,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,并形成山西“北号(票号)南庄(钱庄)”

两大晋商劲旅。

到光绪十二年(1886年)后又陆续在沙市、上海、杭州、湘潭、桂林增设5个分号。据日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,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。在日昇昌票号的带动下,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。很快形成的平遥、祁县、太谷3大帮(均在山西境内),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。

日昇昌共有40多个分号,有员工270名,108年间,共创利白银1500万两,值人民币100亿元。那么问题是,这样的奇迹,利润源自哪里?

这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是:60%来源于异地汇兑的手续费,手续费以1%收取;20%来源于存贷利差;一小部分来源于客户存取之间的利息差;平色余利,即存放银

两时由于份量与成色之差所产生的利润。比如你用100美金换算成相应的人民币,再用人民币换算成相应的日元,再用日元换算美金就不会是100美金了。再比如你一次买5公斤苹果,与你分10次每次买1斤苹果所呈现的重量是不同的。这就是平色余利。当时白银含量最高的是南京银,97.3%,最差的是上海银,70%,当然票号内部自有不同产地白银间的汇兑比例,来补足含银量上的差价,

中国票号博物馆一景



但仍会存在0.5%的平色余利,仅这一项票号就可赚取利润白银8万两。

票号的出现,给各地晋商的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,其业务也因此如星火燎原,迅速扩大。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,从同治年起,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,如人称“红顶商人”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(胡雪岩)在同治二年(1863年)建立了阜康票号。云南人李氏在光绪初年建立了天顺祥票号。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(1883年)建立了源丰润票号,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“南帮票号”。但这时的票号仅仅只是民间资金的流动,并未获得官方认可。

太平天国起义,切断了南方各省向京城运银的道路,票号的机会来了,汇兑官款的大笔生意以瞒上不瞒下的方式拉开了“阵线”。不言而喻,此时中国商界对票号的依赖愈来愈重了。尽管清政府一度强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,但这道圣旨犹如白条。八国联军入侵之后,清政府为解《辛丑条约》赔款的燃眉之急,已经顾不上原来的禁令。事实上,正是在封建政权的特许之下——由于赔款所需的大宗汇兑,票号的生意得以走向高峰。

“日昇昌”终于迎来它扬眉吐气的一天。鉴于票号为国家筹集银两有功,光绪皇帝亲赐匾额,上书四个大字:汇通天下。此后,官家借助票号周转银两,就成了合理合法的生意。光绪十三年(1887年),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,也曾求助于山西票号,争取票号的支持。

20世纪初,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,山西票号也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19世纪80年代,中国电报事业兴起,票号又新设了电报汇兑业务。至此,中国票汇、信汇、电汇3大汇兑方式,都由票号继承和创新完善起来,大大方便了工商业的发展,也使民间基本结束了运现清算的落后状态。

那个时代,日昇昌也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。

(下转第10版)

晋中日报
晚报版

9

人文读本

之

晋商行

2020.6.8
星期一

编辑
张璐
校对
孟佳琪